

歷史與外交

中葡關係中的澳門：1949-1979^{*}

Moisés Silva Fernandes^{**}

引言

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生活了多個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RPC）在建國後約三十年的時間裏並沒有與葡國建立外交關係。事實上，亦只有兩次機會毛澤東政府表現出有意與葡國建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以及1954年為印度支那問題而舉行的日內瓦會議之後。

然而，引致北京在政治外交層面與葡國保持距離的原因何在？從以下三方面主要因素可解釋中國的態度。首先，薩拉查政府拒絕接受中國為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在政治外交方面所付出的努力。第二，儘管兩國沒有正式建立政治外交關係，但北京政府短期內仍可在多個領域控制澳門：如政治、貿易、財政、經濟及社團組織。同時，中國政府以此地作為向華南提供西方戰略性物資的大型倉庫，作為該國官員學習葡國語言及文化的中心。第三，毛澤東思想，即意識形態的原則，與當時建立於“中國土地”上的兩個西方殖民地的事實有著正面的衝突。從中國的立場來看，對有關問題保持緘默，無論對便於政治管理抑或對防止廣東各市中心對不成氣候的“紙老虎—分別是香港及澳門的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產生民憤均是最佳良策。

薩拉查拒絕北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當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際，紅色政權的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向葡國駐中國的外交使節發出公函，表達中國新政府與該國建立外交關係

* 說明：本文不用慣常的正寫方式改以拼音方式為書寫的基礎。因此，凡中文的專有名稱便先以拼音拼寫，然後再在方括號內列出其正寫。另一方面，我們無法在海外歷史檔案處和海事中史檔案處取得資料編撰本文。

** 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的意願¹。儘管葡國駐廣州、香港和上海的葡國領事部長J.B.Ferreira da Fonseca、澳門總督、外交部及殖民部均承認新中國政府，但薩拉查卻表示反對。²

薩拉查對共產主義毫不留情地不予讓步的理念，構成了兩國互不建交的主要導火線。然而，葡國政府元首為免與外交部、海外高級官員及駐里斯本的英國大使所持的相異觀點直接衝突，便運用多項理據來為其行為辯護。首先是援用不應承認未能全面操控其本身所收復的領土或未獲國際承認的政府為理據³，繼而斷然拒絕跟隨英國政府以及北約其他三個成員國（挪威、丹麥及荷蘭）承認北京政府⁴。最後，因冷戰日益加劇的國際氣候以及毛澤東政府於1950年10月25日被捲進韓戰的漩渦⁵，均順應了薩拉查所恪守的政治理念。

乘著舉行日內瓦會議的機緣，中國第二次嘗試與葡國建交⁶。中國外交使團為與葡國建交，曾三次與該國外交代表作試探性的接觸。英國事務代辦僅於1954年7月8日獲准呈交國書後，才獲周恩來接見。中國的代辦根據1954年7月17日於日內瓦所簽訂協議，於1954年10月27日抵達倫敦。

新任中國駐英事務代辦Huan Xiang於1954年11月3日向英國外長遞交了國書，隨後便發出公函予葡國駐英國首府大使Pedro Teotonio Pereira，通知他遞交國書一事，並表示：“本人將竭力建立我們雙方的真誠關係，並希望此事能獲得閣下的友好合作。”⁷翌日，在奧斯陸的葡國部長Luis Norton de Matos將中國駐喀爾新基大使Zhen Xinren的便箋寄給Palacio das Necessidades。便箋內容為：“本人熱切希望與閣下建立良好的關係，以促進兩國的合作。”⁸

然而，中國的這兩次行動均被葡國外交部所拒。對於倫敦中國外交使團的行動，Palacio das Necessidades 元首指示其國家大使僅向對方作出“便箋收悉，肅此致意”的回覆而已⁹。然而喀爾新基的葡國外交使團所作出回覆卻不詳。

-
1. Moises Silva Fernandes, 中國關係中的澳門總覽：年表，文獻，附錄和經篩選的書目，由1945年至1995年，溫尼伯，馬尼托巴，加拿大：馬尼托巴大學，1996年（待出版的未刊行著作）。
 2. Moises Silva Fernandes, 對葡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RPC）關係中“單純合作”的孤立失衡的對外政治，1949–1979，里斯本：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待出版的未刊行著作），第14頁。
 3. 同上，第12至13頁。
 4. 同上，第19頁。挪威與英國於同一天，即1950年1月6日承認北京政府。而丹麥及荷蘭亦分別於1月10日及3月27日承認該政府。
 5. David Clayton 辯稱，1950年春季，國家安全委員會指令是美國政府的一項重大政治努力，旨在克制國際共產主義。美國的對華政策明顯反映出美國欲保護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意願。1950年6月韓戰的爆發進一步引證及激化美國的立場。載於David Clayton, *Imperialism Revisi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950–1954*, 倫敦，英國：Macmillan e King's College London, 1997, 第26及27頁。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1954年日內瓦會議，在政治層面上意味著國際團體已承認北京政府為強國。
 7. 外交部，“駐倫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務代辦 Huang Xiang, 1954年11月3日給駐倫敦的葡國大使Pedro Teotonio Pereira的口信”。2° P., PEA M.184–B, AHDMNE, 里斯本。
 8. 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喀爾新基大使, Zhen Xinren, 1954年11月4日給葡國部長Luis Norton de Matos的口信”，2° P., PEA M. 184–B, AHDMNE, 里斯本。
 9. 外交部，“1954年11月20日發給葡國駐倫敦大使的第218號電報”，2° P., A.59, M.247, AHDMNE, 里斯本。

駐倫敦的葡國外交使團極為冷淡的回應導致中國須另覓對象：葡國駐卡拉奇的外交代表。1955年1月4日緬甸國慶節¹⁰，中國大陸使館代辦與葡國駐巴基斯坦的使館代辦Carlos Fernandes接觸，商討有關事宜：

“友好關係，並指出澳門所具備的貿易優勢。他指出估計正在考慮與葡國建交的可能性。他並提到中國〔台灣〕仍留下一位部長在里斯本，並補充說共產中國與國民黨中國的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¹¹。

Palacio das Necessidade 再一次作出拒絕的回覆。外交部通過政治事務總長Manuel Farrajota Rocheta 發給Carlos Fernandes的電報，指示葡國使館代辦對中國同行的建議採取聽而不聞的態度，並忠告說：

“鑑於澳門處於毗鄰一個動機不明、國際關係情況仍未明朗化的強國的險況，此事變得非常敏感。因此，我們無須仔細考慮其他問題，仍是對其進行觀察。閣下最好避免提及與國民黨建立外交關係之事，因此事肯定會引起毛澤東政府的不滿。在日後的對話中，閣下只宜傾聽該國使館代辦的見解，並將對話安排為私人性質，除非對方是以國家名義來對話。在這前提下，也僅僅在這前提下，閣下才需作出會將有關問題交予政府考慮的回覆。而然，閣下仍須繼續將事態的發展向國務大臣報告。”¹²

1954年12月，在委任Albertino dos Santos Matias 為葡國駐東京使館代辦期間，Palácio das Necessidades再次作出不許可的批示。在會見了按常規到訪的駐日本首都的各個對口的外交使團團長後，Albertino dos Santos Matias 向Palácio das Necessidades請示：“對這些使團〔中國大陸及俄羅斯〕或這些使團的日本官方實體或有的邀請應採取甚麼態度。”¹³

葡國重申其強硬的政策。Palácio das Necessidades 回覆說應予以拒絕。政治事務總長，Manuel Farrajota Rocheta再次指示：“紅色中國和俄羅斯的貿易使團絕不是問題之所在，因為他們與閣下所任職的外交使團並非對口。〔…〕而中國方面，如果其代表主動進行交往或接觸，閣下須盡量並絕對以私人方式禮貌地予以答謝，並適當地向國務大臣報告有關事宜。”¹⁴

日內瓦會議精神所帶來的北京與葡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唯一契機就此幻滅。葡國政治決策者對建交問題不肯讓步的態度成為事態發展的主因。另一方面，則與1949 / 50年期間的情況相反，外交部以往的創造力不再，對官方的政策唯命是從。其原因之一是由於外交部在薩拉查的唆使下，與支持承認北京和與之建交的舊王朝主要領導人員的政策背道而馳。

10. 繼鎮壓民間團體的猛烈浪潮後，緬甸軍事委員會於1989年將該國命名為Myanmar。

11. 外交部，“葡國駐卡拉奇使館代辦Carlos Fernandes 1955年1月8日所發的第2號電報”，2° P., A.59, M.247, AHDMNE, 里斯本。

12. 外交部，“1955年1月8日發給葡國駐卡拉奇使館代辦的第2號電報”，2° P., PEA, M.184-B, AHDMNE, 里斯本。

13. 外交部，“葡國駐東京使館代辦Albertino dos Santos Matias 1955年3月15日所發的第A2號無線電報”，2° P., PEA, M.184-B, AHDMNE, 里斯本。

14. 外交部，“1955年4月16日以政務總長Manuel Farrajota Rocheta的名義發出第A-1號電報給葡國駐東京的使館代辦Abertino dos Santos Matias”，2° P., A, 59, M.247, AHDMNE, 里斯本。

總言之，薩拉查反對承認北京政府的強硬態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至1974年里斯本的政體發生變化後才與葡國建交的主因。然而，北京火速取得對澳門的操控大權，致使中國當局自50年代中期起，一反常態地減弱了與里斯本建交的意欲。這種意向一直維持至鄧小平所領導的溫和派的崛起，以毛澤東妻子江青為首的激進派於1978年倒台。¹⁵

北京對澳門的控制及利用

中國共產黨（PCC）早在執掌中國大陸政權之前，已預先加強其當時對澳門華人群體的影響力。與此同時，更在該飛地設立“高級專員公署及秘密政府”，最後創立大批新的同業公會。這些公會對該地區影響深遠。

中國共產黨的首要工作便是招納在該飛地具有政治、經濟及社會威望的傳統華人團體。因此，中華總商會¹⁶、鏡湖慈善會¹⁷及同善堂慈善會¹⁸便成為以澳門紅色愛國資本家何賢為領導層核心的機構。除了作為該地區傳統的同業公會的領導者，新的中國當局，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便著手要為該地區設立一“高級專員公署”以及一個“秘密政府”。位於北方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外貿部，於1949年8月28日創立了南光貿易公司¹⁹，其目的是監管親北京新政治體制的當地華人社群的政治生活以及該地區的貿易活動，並與葡國當局保持暗地的接觸。

與此同時，協調和領導親中國大陸新政府的當地華人社群的大批非牟利團體相繼成立，如作為該地區共產工會中心的工人聯合總會、各個工會及街坊協會、華人學生和教師總會以及婦女聯合會等²⁰。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街坊會〔街坊聯合

15. 毛澤東去世後，中國共產黨中兩個主要派別的鬥爭，參照Ruan Ming的最佳著作。Ruan Ming為胡耀邦的副手，後者1981年至1982年間任中國共產黨主席以及1982年至1987年間任該黨總書記。載於Ruan Ming,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由Nancy Liu, Peter Rand及Lawrence R. Sullivan翻譯成英文出版; Boulder Co, 美國: Westview Press, 1994年。

16. 中華總商會創立於1913年。1950年何賢及馬萬祺分別當選為該會的正副主席。載於Macao Chamber of Commerce (<http://www.acm.macauweb.com>), (1999年7月29日), 第5頁。

17. 該同業公會創立於1870年，其主要的收入源自該飛地的主要商人和華人資本家的捐獻以及澳門社會工作司發放的津貼。載於澳門：小專題著作，里斯本：海外總辦事處，1965年，第38至39頁。

18. 該團體於1829年成立並於1947年12月宣佈成為公益機構。載於António do Carmo, 東南亞的中國與澳門教會（前途如何？），澳門；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學會及東方葡萄牙學會，1997年，第612頁。

19. The Forty Years of Nanguang (Nám Kwóng), 1949-1989年，澳門：〔南光（集團）有限公司〕，1989年，第53頁。

20. 對澳門婦女聯合會的成立日期兩種說法不一。Isabel Machado認為，該團體係於1949年5月21日正式成立，旋即開展工作，於1950年4月舉辦掃盲課程，1952年開設托兒所並於1955年開辦學校。載於Isabel Machado, 《婦女的聯合主義》“，澳門，第2組，第41號（1995年9月），第54至55頁。然而，António do Carmo卻駁稱該同業工會係於1937年成立。載於前述的Antonio do Carmo著作。

會)。該聯合會在澳門擔當類似“中國共產黨地區基層組織”的職能。換而言之，是一個擔當著監管、指導和教育居民的職能的團體。然而，除了這些基本的活動外，街坊聯合會還參與其他三大類活動：“對社會及社團的參與；證明各種情況及為這些情況提供資料；分析個人或群眾的問題並予以指引和處理”。²¹

這種對傳統團體、國有企業以及當地的新同業公會的監控，令北京政府對該飛地的政治、經濟、貿易及財政活動具有全面的影響。與此同時，也加強了紅色政權與蔣介石政府爭奪當地華人同業公會的影響力。

北京在“幕後”對澳門所行使的權力和施加的影響力，使該飛地成為中國大陸向外國取得西方戰略物資的重要“後門”以及中國官員學習葡國語言和文化的中心。事實上，澳門後來成為北京政府在政治上賴以生存的西方戰略性物資的大型輸入、儲存和轉運中心。於是，各類燃料、金屬、化學品等便大量經澳門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違反西方對中國大陸的封鎖，因此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OTAN）極秘密的巴黎統籌委員會（COMCO）²²及中國委員會（COMCHI）²³的會議中成為被針對的其中一個目標。根據1950年至1955年間首位擔任該委員會的葡國代表Jose Calvet de Magalhães大使所述：

“作為葡國駐巴黎統籌委員會代表，約在五年的時間裏，本人須執行其中一項最艱難的使命。澳門違反封鎖政策是美國代表不斷地向巴黎統籌委員會投訴的原因。投訴者還包括一些其他代表，尤其是英國代表，他們一般都是最固執和最強硬的”²⁴。

當殖民地部長Sarmiento Rodrigues詢問是否可在澳門設立一個政府供應機關以防止該地違反西方對中國大陸的封鎖，澳門總督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ra極力反對，並力主：

“澳門完全依賴中國的供給，龐大人口每日必不可缺的糧食亦有賴從北京共產政府所監管的鄰近地區輸入。似乎一切由我們，而並非由美國主動作出的禁止或限

21.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e Conceição Gomes, 澳門：小龍，波爾圖：Edicos Afrontamento, 1998年，第432頁。

22. COMCO（巴黎統籌委員會），或COCOM（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是一個成立於1950年1月，由北約操縱的高度秘密組織。該組織負責指引、跟進及監管針對當時的蘇聯、東歐國家以及中國大陸的國際封鎖制度。除冰島和日本外，該組織幾乎由所有北約成員國組成。日本於1952年加盟，而葡國則於1951年4月30日，應英國政府的邀請加盟該委員會。

23. COMCHI（中國委員會），也簡稱為CHINCOM（China Committee），1952年7月28日至8月2日，於五大西方強國（加拿大、美國、法國、日本及英國）所舉行的華盛頓會議中創立。該組織成為極秘密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屬下的永久委員會。其主要職能是制訂、協調和跟進針對中國大陸、北韓和北越的西方戰略性物資的貿易封鎖的國際制度。換句話說，它起著西方針對亞洲三個主要共產政府的經貿策略協調處的作用。外交部，“葡國駐倫敦大使，Rui Enes Ulrich發給外交部部長，Paulo Cunha的1952年8月11日第765號公函”中的“Text of Recommendations Agreed at the Washington Five Power Talks”，2° P., A, 6, M.247, AHDMNE, 里斯本。

24. Jose Calvet de Magalhaes, 戰爭中與戰爭後的澳門與中國，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2年，第78頁。

制貨物從澳門輸進這地區的行動，均可引發對我們不利的極重大的反應和激烈的報復行動，最終將導致中國中斷向我們供應不可缺少的糧食。”²⁵

澳葡政府對中國大陸的供應絕對依賴的這一弱點，以及中國對第三世界解放運動的支持政策，促使北京利用澳門作為中國官員學習葡國語言和文化的中心。中國特別是在中蘇出現分歧後，出於須對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的解放運動產生影響力的迫切需要，該國共產黨在澳門開辦學習及進修葡國語言的課程，使中國官員熟悉葡人的文化和社會行為。在澳門接受培訓的官員當中，包括外交部外交官²⁶、北京電台的播音員和節目主持人²⁷、官方刊物（宣傳機關的雜誌和書刊）的翻譯員²⁸、國防部政治軍事教官。這些教官負責任教在中國²⁹和非洲³⁰舉辦的培訓課程，該等課程是為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中從事解放運動的游擊隊而設。中國大陸在該飛地的自由度之大，甚至可向派駐澳門的莫桑比克贊比西河地區人的駐軍以及葡國官員推行教育運動³¹。由於葡國中央政府害怕該運動會在莫桑比克引起反響，於是，60年代初便決定從澳門撤走莫桑比克人的駐軍。

理論與實踐間的矛盾

儘管毛澤東政府曾正式聲明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並在政治、軍事、外交和財政上支援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然而，毛澤東政府在7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未以任何實際行動來遏止葡國與英國在華南的殖民擴張。私底下，中國當局亦從未表示過希望該兩個西方飛地回歸中國大陸。中國中央政府至少五次在非公開場合明確表示反對這些飛地歸還中國。中國共產黨在執掌中國大陸政權的數月前已決定不會

-
25. 外交部，“1951年3月7日由澳門總督Albano Rodrigues de Oliveira發給殖民地部長Sarmiento Rodrigues的第162/48號機密和秘密的公函，第二頁”，2° P., A, 6, M. 405, AHDMNE，里斯本。
 26. 60年代一些在非洲大陸執行職務的中國大陸外交官，為了與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的解放運動建立和保持聯繫以及為了了解葡國的殖民政策，必須學習葡語。
 27. 60年代初，北京電台開始以短波向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葡國和巴西播送葡語節目。根據PIDE，北京電台於1960年10月14日開始以葡語向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廣播。國立檔案處 / 東寶塔 “1960年10月25日第561/60-GU號報告書”，AOS/CO/UL-32A1, Pt. 8, fl. 373, AN/TT, 里斯本。
 28. 北京的文字宣傳機關於60年代著手以葡語出版書籍和雜誌 尤其是Pequim Informa、China em Construção雜誌、名為Obras Escolhidas de Mao Zedong, as citações do Presidente Mao Zedong的書籍以及有關“中國社會主義”的袖珍專題著作。
 29. 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招收來自第三世界的游擊隊員的主要軍事培訓中心為南京政治軍事高等院校。此外，該院校的政治軍事指導手冊獲秘密警察以及委員會主席薩拉查所承認。國立檔案處 / 東寶塔，南京政治軍事高等院校所舉辦的有關叛亂的課程，不公開本，第一冊，由秘密警察派駐盧旺達的辦事處副監察員Antonio Baptista Potier編輯和制作。
 30. 中國的政治委員和軍事訓練員在位於坦桑尼亞，剛果 - 布拉柴維爾，加納及畿內亞 - 科納克里的軍營，培訓和跟進為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游擊隊員。
 31. 國立檔案處 / 東寶塔，“1962年2月1日澳門地區獨立指揮就‘澳門現今的共產黨組織 - 莫桑比克要塞的教育’所作的4 / 62號機密與特別報告”，PIDE / DGS，案卷第408 - SR / 62號，N.T. 3181，第18頁，AN/TT，里斯本。

以武力收回香港和澳門。1949年2月1日至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成員與蘇聯獨裁者斯大林的使節於河北省西柏坡所舉行的秘密會議³²中，毛澤東對Anastas Mikoyan表示：“唯一承諾便是決定延遲收回香港和澳門這兩個殖民地碉堡，這是基於該兩地對中國的經濟利益”。³³

另一方面，1952年9月3日，斯大林於莫斯科會晤周恩來總理期間，這位蘇聯獨裁者詢問有關澳門的情況，中國總理回答說：“澳門，一如既往，依舊在葡萄牙手裏。”斯大林回答說：“中國大門前的渣滓必須清除。”³⁴甚至在中蘇快將結為盟友之際，1949年2月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主席的身份重申該黨對澳門和香港的官方立場。1959年10月14日，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於北京接見蘇聯漢學家S.F. Antonov時，毛澤東盡力向俄國人保證中國不會與美國以及鄰近的亞洲國家爆發戰爭，而北京政府對澳門的立場維持不變。根據Antonov，毛澤東表示：

“目前中國甚至有像澳門這樣的外國殖民地。諸如葡國般的小國，四百年前從中國奪去這片土地。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該如何處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經考慮後決定——我們暫且不處理澳門問題。因此，說到中國主張戰爭，這點並不是事實，然而戰爭有時是可作為向對手展示我們堅定意志的手段。”³⁵

在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訪華期間，毛澤東的立場再次被周恩來總理所引用。在一次兩國領導人的會議中，中國政府元首堅持解放非洲的葡國殖民地為其政府的首要任務。至於澳門，周恩來總理堅稱，葡國“甚至佔有我們一小片領土，一個極小的稱為澳門的地方，並將其視為葡國的領土。該土地於四百年前被擄去。我們許多同志均說只要我們運用一指之力便可收回澳門，但我們依然保持一種高度堅持的態度並希望再多等一些時間。”³⁶

32. 出席這些會議的還有1959年至1967年間的國家主席劉少奇；1949至1976年間人民代表大會主席，歷史上的元帥朱德；1949年至1976年間的總理周恩來以及1949年至1958年間的外交部長任弼時。載於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紐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69頁。

33. “His one compromise was his decision to defer the seizure of the colonial bast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because of their economic value to China.”載於Shi Zhe, 〈在歷史巨人身邊：Shi Zhe回憶錄〉，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抄錄自Goncharov, Sergei N., Lewis, John W. &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史丹福，加利福尼亞，美國：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40頁。

34. “Macau continues, as before, to be in Portugal's hands”及“this scum that has situated itself on the very entrance to China must be driven out”。載於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第6至7號，（1995/1996年冬季），第16頁的“Record of Meeting Between Comrades I.V. Stalin and Zhou Enlai (1952年9月3日)。

35. “...in China up until the present time there are even colonies of foreign states, like Macau. A small country, like Portugal, 400 years ago grabbed from China this chunk of land. How should we proceed in this case? The CC CPC considered this question, and worked out a course, which for now consists of not touching Macau.”載於“Summary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C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on 14 October 195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第3號，（1993年10月），第57頁。

36. “尼克松訪華時期的澳門”《句號報》，第7年，第335號，第2組（1999年4月23日），第20頁。

1973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高級官員的有關對外政策的全體會議中，周恩來在其提交的國際政治形勢報告³⁷中抨擊中國政府內的“極左分子”，他指出：

“堅持人民鬥爭是正確的，然而卻不應進行冒險的行動。馬達加斯加外長對我表示，在他的國家裏亦有一些希望把法國人驅逐出去的“極左分子”。我對他說，這對我來說並不稀奇，因為在中國以及在蘇聯的修正主義者中也有這種人，他們向我們施壓，要我們收回香港及澳門。我對他們說，澳門不可收回，收回香港更免提了。收回澳門會對香港和英國造成動蕩，並且會導至該國與美國結成聯盟，這點是我們不能容許的。此外，我們還有台灣。要解決台灣問題，需要時間，不應訴諸武力。我們應顧及牽涉到有關問題的各方。香港和澳門，與台灣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應以不同的方式處理。”³⁸

事實上，中國大陸當局甚少就澳門問題公開表態。可感覺到有關問題確實是一個禁忌。從1949年至1979年期間，也只有五次特別的機會中國大陸曾公開就該飛地表態。

第一次正式的時機是1955年，在取消紀念澳門四百周年活動之後。中國中央領導層在透過香港總督葛亮洪非正式地迫使澳葡政府取消有關的紀念活動後，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機關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有關澳門的詳盡文章。文中堅稱：“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忘記澳門，也從來沒有忘記從葡萄牙人手中收回該領土的權利。〔…〕澳門尚未歸還中國，並不表示中國人民可繼續容忍澳門永無了期地被佔領。”³⁹

在中蘇不和時期的初始，北京被迫公開回應蘇聯以及與莫斯科同一陣線的西方共產黨對中國與澳門的薩拉查政府合作的指控。最初的指控是源自美國共產黨。《人民日報》於是被迫作出回應，捍衛必須保持現狀的態度，澳門、香港及台灣的問題應“在適當時機和平協商”來解決。⁴⁰另一次指控是出自蘇聯共產黨官方機關《真理報》。藉1964年2月國際主要報章刊登的有關北京政府迫切承認葡國的報導⁴¹，《真理報》於1964年7月8日發表社論，指責中國對承認葡國一事保持緘默以及藉詞將中國的鴉片經澳門輸往外地。面對該公開指控，新華社於當月28日發表社論，否認中國政府嘗試與葡國建立外交關係，並重申中國支持第三世界的獨立事業。然而，從該社論中不難看出中國有意維持澳門的現狀。

37. Kenneth G. Lieberthal e Bruce J. Dickson, A Research Guide to Central Party and Government in China, 1949 – 1986, 經修訂及增訂的第2版, Armonk, 紐約, 美國: M.E. Sharpe, 1989年, 第221頁。

38. James T. Myers, et. al, Chinese Politics : Documents and analysis, 第二冊, 哥倫比亞, 南加羅林, 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年, 第258頁。

39. “A Warning to the Portuguese Authorities in Macau” (北京,《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6日, 第1版; 新華社1955年10月26日英文版公報), 由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重新印制, 第1158號, (1955年10月27日), 第36頁。

40. 前述 Moises Silva Fernandes 的著作, 中葡關係中的澳門總覽, 第99頁。

41. 有關1964年1月/2月 Franco Nogueira 試圖勸阻薩拉查承認中國大陸並與其建交, 參照 Moises Silva Fernandes, “1949年至1966年間葡中關係架構”, 行政, 第2冊, 第40號, (1998年6月), 第323至第326頁。

另一方面，1966年12月3日及4日所發生的事件，導致1967年葡國當局被連番公開衝擊之後，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元帥，在接受一名巴西律師 Danilo Joaquim Guilhermino dos Santos的訪問時表示，有“一個準則來處理屬中國地區的台灣、澳門及香港的問題”。該元老認為：

“我們應先解決最重要的，換句話說，即是台灣問題。然後，在適當的時機，要求收回今天被紅衛兵稱為帝國主義者的旅遊城市澳門和香港”。⁴²

1972年，毛澤東政府最後一次就澳門問題公開表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獲接納加入聯合國之後不久，中國駐紐約大使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特別委員會主席 Salim A. Salim，要求從要廢除的殖民地領土的名單中將澳門及香港刪去，並重申該兩國飛地均是中國的領土；在該國認為最合適的情況下自會就其地位進行談判。⁴³

政治矛盾之嚴重，以致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親撰的一篇涉及澳門和葡國問題的文章進行審閱。1952年8月，在澳門與中國的邊境糾紛處於緊張的時刻，為免中國最高領導人尷尬，以及為免中國對有關澳門與葡國的政策產生嚴重的矛盾，北京人民出版社發行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新中文版本中，對“偉大舵手”所著的題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文章中提及有關葡國和澳門的部份進行大肆而模糊的修改，但1939年12月發行的初版，至1949年版本則保持原稿內容，其中提到“……諸如葡國般的小國佔領了澳門”⁴⁴，而新的版本中將一切涉及葡國及澳門字眼全部刪去。⁴⁵

結論

毛澤東思想在澳門引起了重大反響。50年代前半期，北京政府為兩國的互相承認及建交付出的努力，因薩拉查的強硬及不包容的理念而告夭折。儘管結果如此，然而，中國大陸卻在短時間內，成功地操控澳門的各個領域：政治、貿易、金融、經濟及社團。同時，將該飛地變成華南一個最重要的戰略性物資倉庫以及中國官員學習葡國語言和文化的學習中心。這些官員負責執行中國的政策，支援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的解放運動。最後，北京政府被迫將意識形態上的利害關係擱置一旁，例如，其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的政策，並採納極溫和的立場，無論於私人方面抑或公共方面，其宗旨均是要保持兩個西方飛地的現狀。

-
42. Danilo Joaquim Guilhermino dos Santos, “中國宣告已作好準備迎戰美國及蘇聯”, 巴西報, (1966年12月11日), 第一冊, 第8頁。
43. 前述 Moises Silva Fernandes 的著作, 中葡關係中的澳門總覽, 第202至第446頁。
44. 毛澤東,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Digest, 第5冊, 第9號 (1949年3月22日), 第21頁; 轉載於 Current Background, 第135號 (1951年11月10日), 第7頁。
45. 毛澤東,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第2卷, 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2年8月, 第311頁; 毛澤東所著的題為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的手冊, 第一版, 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年10月, 第17頁。

